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一期 ——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1b)

【往事非烟】	我这四十年	老鬼口述·丁东、赵诚采写
【春秋史笔】	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	雷 颐·丁 东
【口述历史】	几度风雨几度秋（上）	李冬民·阎阳生、米鹤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我这四十年

• 老鬼口述·丁东、赵诚采写 •

本名马波，1947年生于河北，小说家。其母为《青春之歌》的著名作者杨沫。文革前，老鬼为北京47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曾因有反动言论被关押。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法制日报》工作。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

◇ 儿时的电影

我年轻的时候，除了国内的小说电影，主要是受俄罗斯文学和电影影响，当时也就能接触这些。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他为了锻炼意志睡在上面有很多小钉子的床板上，印象很深。书中的主人公罗普霍夫、吉沙诺夫等名字现在依然记得。自己从小能自觉的去磨练，去吃苦，与这本书有关系。

现在的人们当然不追求这些看上去很“傻帽”的精神了，可我的童年都是看英雄主义的电影长大的。50年代这种题材的电影特别多，我记得给我印象特深的是《钢铁战士》，主角是张平演的。讲述咱们一排解放军战士突围，排长跳崖摔伤被俘，另一个小战士和老炊事员也被俘。

国民党军官劝他们投降，小战士佯装写投降书，用钢笔扎瞎了国民党军官的眼睛，立即被敌人枪杀。老炊事员当了叛徒。而这排长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解放军把敌人消灭，救出了排长。他已被折磨得蓬头垢面，像个野人。结尾是他把胡子刮了，英姿飒爽，端着刺刀重新站岗。还有《董存瑞》也看了好几遍。那个董存瑞很有个性，他好强，爱和人摔跤，有些虚荣，还有点小脾气。我看了后就抱着枕头钻到桌子底下“炸碉堡”……一遍一遍地玩儿。

看完这些电影后久久沉浸其中，产生了强烈的学习他们，模仿他们的冲动。苏联电影也如此，记得有个苏联电影叫《从小培养勇敢精神》，一开始就是一群小男孩在水塘里打水仗，一小男孩被打得很惨。他父亲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被沙皇通缉。一天他秘密回家，这时警察敲门了。他将自己的一把手枪送给儿子，从容被捕，不久即被杀害。这个儿子就拿着爸爸留下的枪去找红军。当时苏联内战连绵，社会很乱。他在路上碰见另一个小孩，也自称也去找红军，两人就一块结伴而行。但一个晚上睡觉时，那小孩用大棒子把他打昏了，并说：死前让你明白，我爸爸是白军军官，我要找爸爸去消灭你们这些赤匪。当正要最后打死他时，这小孩偷偷拔出爸爸留给他的枪，把那白军军官的小孩打死。最后他终于找着了红军。电影《保尔·柯察金》是60年代上演的，保尔曾偷了一把手枪，藏在老鸦窝里。还有《小兵张嘎》主角也偷过枪，这都给当时的小男孩一种强大的影响，喜欢武器，喜欢枪。我在文革中四处搞枪，跟这些电影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的个性就是特别容易受感动、受感染，跟母亲一样。看了故事后总要模仿，我妈看了侠客小说后，就要当侠客，我看了革命电影后就要当革命者。年轻的时候干了很多举动很怪的事。比如在育才小学时，以穿旧衣服为美、为荣、为革命，认为穿新衣服是资产阶级的，觉得越破越革命。因为那时正面人物都是穿破旧衣服，只有反面人物才是西装革履。所以女同学若穿件花衣服就很瞧不起，斥之为“资产阶级”。

◇ 狂飙初起

文革一开始我是反对血统论的。我们学校47中有两个红卫兵，一个是血统论的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为基础的红卫兵，一个是反对“对联”的红卫兵。反对“对联”的红卫兵是先成立的，但被排除在主流红卫兵之外。拥护“对联”的红卫兵占大多数。

我们反对“对联”的叫“47中红卫兵”。我们的头头叫杨志刚，他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反对血统论。我们在当时是少数，受压的。“8·18”毛主席接见的都是赞同“对联”的那一派。我们学校在西郊温泉，那一带军队机关较多，故军队子弟不少。文化革命可闹腾了，在海淀区是有名的，比101中还厉害。学校附近的北安河、周家巷等农村的地富反坏几乎全都被我们学校红卫兵和当地贫下中农给打死了。

我们学校卫生室谢大夫的母亲也被打死。文革初期说她母亲是地主婆，给遣返回原籍，但过了一段时间，她母亲可能无法生活，又返回北京。在学校大门口，让人发现。一群初中小孩就开始打，后来发现她的小包袱里有把剪刀，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就说她企图阶级报复、行凶杀人，打得更凶狠。最后有个同学一脚把她从桥上踢了下去。我们学校门口的那座桥虽然不高，可桥下是干涸的河床，里面有很多石头。老婆婆当场就死了。她女儿吓得流了产。学校团委书记黄秀玲老师也给打流产。我们这派是反对打人的，因我们这派的头头都是高中的，比较沉稳。但高中也有个别人打人，这是人性邪恶的大暴露。打人最狠的、最热衷的竟然是文革前，校领导很重用的同学。比如高三四班有个贫农子弟，文革前是三好生，很积极，但没入了党。文革开始后就说校领导迫害贫下中农子弟，不让他入党。对校领导和老师打得特狠。老师一提他就摇头，不敢相信这人变成这个样子。

当时围绕血统论展开过激烈辩论，我们受到了围攻。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中央文革肯定了我们。我们的观点被实践证明对了，很有满足感。“对联”那派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四三”派，对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成了“四四”派。

拥护对联的还有个叫“红红红”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初中的，革军子弟居多，头头是彭忆东。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他写了一个《在社会的档案里》，从文革初的极左变成了批判现实的先锋，因为这个，北京市检察分院不要他了，调到全总文工团搞创作。

我文革时持这种态度和家庭背景是有关联的。我父亲是文教界的干部，当时陆平被揪出来了，我爸是北师大副校长，副书记，当然同病相怜了。但我不支持这个“对联”，靠的还是一种本能，从没想过这“对联”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很多人支持这个“对联”是觉得“对联”能给他带来好处。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对联不符合毛主席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为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些日子整天学毛选，翻毛选……，从毛选上看党的政策是不唯成份论的，不搞血统论的。自然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出身有问题，这种受压的处境，也确实促使我不喜欢这副对联，使我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很同情。我妈属于文艺界，当时文艺界被认为是烂透了的，统统是黑帮。陆平的女儿正和我一班，她爸被揪出来后，我还公开给她写过一条纸条，向她表示同情。这事后来在兵团被人揭发出来，说我同情大黑帮陆平。

我这些思想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觉得毛主席对出身不好的态度不是打击排斥的。周总理也曾说过，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所以我本能地反对“对联”。后来有一段我还当了学校的一个什么委员。自从1966年10月陈伯达讲话批血统论，我们这派翻身了，有人推举我当了学校革委会筹委会的委员，掌了些权。时值1966年年底，我们还成立一个47中战斗营，把出身不好的都弄进来了，包括陆平的女儿，以前没有组织敢要她。那时候我们整天学马列，找理论依据，防备对方揪我们的辫子。后来有点累了。当这个委员成天开会，还有一些人总追着我，哭着喊着要当红卫兵。高三四班有个同学，文革前年年都是三好学生，爸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成了走资派，她当不了红卫兵，找我哭啊，恳求呀，死活要当红卫兵。整天处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心神交瘁，就不大想干了。

◇ 抗美援朝

这时一个同学从云南回来，说有不少人到越南了，去抗美援朝。我最初认为不可能，但他说绝对可能，有人都参了战，并列举实例。这我才开始相信有可能，于是暗中组织了一帮人。1967年4月出发。我们是属于去得晚的，最早的1966年10月份就过去了，还有人牺牲在越南。其中一个装甲兵副司令员赵杰将军的儿子赵建军。

我们一共10个人，8个男的2个女的，都是我们学校的，算是我拉的队伍，叫“毛泽东抗美援朝铁血团”。经过1966年疾风暴雨般的运动之后，又经过大串联，跑野了，没有心思再回到教室搞什么“斗批改”，实在坐不住了。支援世界革命已经不再遥不可及，白日做梦，好像唾手可得。当我们几个一聊起去越南，越说越激动，说得热血沸腾，心跳加快。记得我们是在学校游泳池的一间屋子里策划和组织的，当时我住在那里。我们聊着去越南后可能会碰到的种种情况，觉得马上就要为革命捐躯，要为世界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了。既悲伤又兴奋，禁不住热泪纵横。

这个行动我们都没有告诉家里。为解决路费，我就抢了自己家里的钱，意思是一去不复返。当时父母都不在家，就个两姐姐。我走前把她们都绑上了，怕我前脚走，她们后脚就去报告。为了延长她们晚一点报告的时间，我才把她们全捆起来。这些我都写进我的书里。平日我和家

里的感情很淡。还有一个目的是用此行动断了自己的后路，强迫自己义无反顾地去越南前线。

抄完家后，我们真奔北京站，上了北京到凭祥的5次特快。当时觉得买全程票太亏，就买了到石家庄的票。到石家庄后查票时，我们被发现，列车长就把我们骗到餐车，然后叫来一群膀大腰圆的大师傅，通过餐车窗户把我们一个个给扔下车。我有一个背包和一把刺刀没来得及拿，就丢在车上了。后来就只好扒货车，一直扒到凭祥。在货车编组站，每辆货车车厢上都有一个小卡片，写着去哪，我们就通过这个知道货车的目的地。最脏的是煤车，比较舒服的是放机器的车厢，很干净。还有平板车箱，一辆一辆解放牌卡车擦着，我们多次藏在汽车下面。

那些天真是风餐露宿，我们一会分散，一会汇合。中途还被人抢过。扒货车的什么人都有，乌合之众，有的是红卫兵，有的就是劫道的。常常打架，谁拳头硬谁生存，谁拳头硬听谁的。有一个晚上在一小车站上来一帮子人劫住我了，问我要钱。从家里抢的200块钱就在身上，但不能给他们，这是铁血团的经费。为首的是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我背包里有一把斧子，就掏出来和他们对峙，对峙到了另一小车站，这帮人都下车了。我就去找我的一哥儿们，说有人劫我。等天亮后我们一个车厢一个车厢找，找到了就打。这帮人是乌合之众，临时凑成的团伙，哪儿的都有，专劫那些单个的人。后来找见那领头的了，上去狠打，直到他求饶为止。他说他被人抢了，身无分文，只好也抢别人。我们继续找另一个目标。最后在守车里发现，打完后我还把他一脚踢到车下。当时火车正上坡，走得很慢，夜色中我看见他跟在列车后面跑了几步，就消失在黑暗里。那时血气方刚，又有崇高的理想支撑，拿出对付美国鬼子的劲头，痛打这些小瘪三。

中越边界当时并没有界桩。走大路通过友谊关，有人站岗，走小路没人管，走上一会儿就过去了。越南人不会说中国话，但连猜带蒙，也能知道意思。头一次，到了那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家捉住遣送回来了。我们出发了三次都失败而归。一次是被越南人抓住了；一次是被广西当地的民兵抓住了；还有一次走着走着，丧失了斗志，自己返回了。

第一回是被越南公安抓住，我们的部队又把我们要回来，最后送回国。自从总理说“去越南的红卫兵，他们的动机、想法是好的，但这样的做法不好，要劝他们回来”之后，咱们的援越部队就不接受红卫兵了，我们到越南以后，援越部队让我们好吃好喝一顿，就把我们送回来。部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友谊关的边防站。边防站的干部负责处理，他们要政审、检疫、打针。完后，就放我们走了。

从边防站再步行20公里走到凭祥，那真是又累又饿。过去后最大的痛苦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每回都特别饿。我们的目标是越南南方，去打游击。我们当中有一人的姐姐在河内，想找到他姐姐，让她姐姐把我们送到南方。我觉得我们没有走到南方的最大原因是饥饿。在山林中行走没人能发现我们，但要长久生存不行。没吃的、没喝的，逼得你要走出山林，到有人烟的地方找吃喝。我们要是能解决吃饭问题，保准能一直走到越南南方。我们最远一次到了谅山，再远就不行了，饿得不行了。只要一离开深山，下到公路找吃的，就会被发现。越南北方当时是战时状态，公安民兵特别多，严防美国空降特务。而一到有人烟的地方，马上就暴露了。越南的公安马上就来了，让你跟他走。那时对我们还算友好，还行。

还有一回没过边境就被广西当地民兵抓住。对我们最凶的是广西边境的当地民兵，他们对北方人有一种排外的敌意，打起来真打。我们被他们抓起来后又逃跑了，他们很气愤，就敲响紧急集合，村里老头老太太都动员来，拿着扁担、棍子追我们。后来，被他们抓住了就狠狠打，还叫我跪下，我不跪，就拳打脚踢。

他们把我们送到边防站。但一出边防站就自由了，自己走回凭祥市委。市委已经瘫痪了，

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把市委的二层小楼都住满了，都是要去越南的。凭祥市离越南就20公里吧，是离边界最近的一个小城。这里哪的红卫兵都有，有一个还自称是聂荣臻的儿子，后来知道是一个骗子，也被我们狠打一顿。我特别恨骗子。此人自称武汉某学院的，名叫聂军。跟这人说一套，跟那人又说一套，四处向人借钱。有几个上海男女猛巴结他，也有人对他身份表示怀疑，他动不动就说：你不信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去！凭祥市的一个老警察负责接待我们，逐一登记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并去电话核实。最后他告诉我们，军委办公厅答复说聂荣臻根本没这么一个儿子。我得知此消息后，找到这家伙，左右开弓，拳脚并上，好好教训了一番。还听说有一个青岛来的小姑娘，独自去越南15次，死活要抗美援朝，后来她哥哥把她接回去了。这也是老警察告诉我们的，当时我很感动。想想我们去了三次就没信心了，真惭愧。

◇ 西藏之行

回北京后，我以后就没回家，住在我姑姑那儿。我从小是姑姑把我养大，所以我和姑姑很亲。姑姑就去我们家找我爸，说我回来了。父亲表示每月继续给我生活费。之后，我就住在学校了。时间一长，父母自己处境不好，与我的关系就缓和了。前些时候我写回忆母亲一书时，得知挨绑的小胖姐姐还曾替我说过话，说我抢家里的钱，父母也有责任，因为他们平日对我太不关心了。我真没想到，我绑了她，她还替我说话。我很感谢她。

这次去越南连去带回一共两个来月吧。我们是1967年4月走的，6月份回来的。这年8月份，我们学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打得特别厉害，还打死一个。我们的组织“毛泽东思想公社”人数虽多，但有一大批出身不好的，比较老实胆小，没有力量，老挨打。

8·21武斗起因是抢夺广播室。广播室原来在我们这派手里，他们来抢，把我们这派的人打伤了。我们就叫外校的人来支援我们，来的是北京钢校的，都戴着柳条帽，拿着棍子，表面上挺吓唬人。到了47中后，“主义兵”纷纷后退。但这帮人不熟悉地形，我们学校在山脚下，“主义兵”退到一个坡上，用密集的石块往下扔，钢校的人柳条帽顶不住，就后撤，一撤就乱了。“主义兵”乘势追击。有一个学生跑的较慢，被追上了，众人围着一顿打，当场毙命。我记得他叫丁世德，当时被授予烈士称号。海淀分局来人勘察了尸体，也追究了。但因为是集体打死的，后来抓了几个人，关了一段时间，就给放了。

“主义兵”那派打死我们的人后，害怕遭报复就都撤离了学校。偌大学校空无一人。这时候我和一个后来的好友杜厦住在学校。他们“主义兵”、“红红红”的宿舍被人砸了，丢了很多东西，如皮箱、皮鞋、军毯、被褥等物。学校附近的农民可能顺手牵羊偷了一些东西。但对方却怀疑是杜厦偷的。杜厦虽然出身不好，但骨头特硬。一般出身不好的都胆小怕事，他出身不好，却勇敢得很，老和对方辩论，所以对立派把他恨之入骨。“8·21”武斗后，他们就说杜厦抢了“回力鞋”（1）等，总想打他。他只好四处躲避。武斗后，学校没法呆了，我听说西藏好弄枪，就想去西藏。杜厦呢，为了躲避对方追杀，也决定和我一块去西藏。

我们是从格尔木，青藏线进去，从川藏线出来的，川藏线沿途风景美丽极了。在唐古拉山口时，有一辆车翻到沟里，我们只好把货卸下来，搬到另一车上。我们本来可以不干，但看见工人都在干，我们站着也不好，就帮着卸。一动就喘，特别喘。脚上像踩了棉花，软绵绵的。过了唐古拉山就到了拉萨。自从平叛之后，西藏的基层干部都配着枪，所以我想来西藏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弄支枪。1967年秋，内地抢枪成风，河南二·七公社大规模武斗，到处都动枪动炮。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抢把枪也不算事。我们在拉萨发现了一个当兵的，走到哪儿都背着一把带皮套的五四手枪。拉萨城市不大，只有罗布林卡、大昭寺等几个名胜，老碰见这当兵的，因此萌生了夺他枪的念头。为了不打死他，我用床单将斧头把儿厚厚地裹起来，以防打坏头骨。但那晚上他没有出现在我们埋伏的地方，此计划落空。

后来返回路上，我们在昌都狠狠地偷了一批刀剑，十几把，有长有短，特漂亮，一些刀把上还镶嵌着宝石。由杜厦进去偷，我在外面放风。这是昌都公安局的一间小土房。回到招待所一看，哪把刀都爱不释手。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让回去给捎把刀。我们担心回去这几把分不过来，就计划再偷一次。但第二次偷时，当场被抓。结果连同第一次偷的全部被没收，我身上带着一颗手榴弹也没收了。经过与我们学校打电话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就把我们释放。这次教训是太贪婪了，要不偷第二次，就能带十几把刀回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干许多平时不可能干的事情。

◇ 搞到三支枪

从西藏回来后，我们觉得8·21武斗已过去好几个月了，估计没事了。1967年12月7日，我和杜厦就悄悄溜回学校。结果被对立派发现后立即报告了他们的头头。他们就来了很多人把我们堵在宿舍，抓住杜厦猛打。他们没打我，因为我出身好。把他扭送到军训团办公室后还继续拳打脚踢。那晚，满院子都是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只有几个人在旁边死死护着他。但护不住啊，他们人太多，有上百号子人。

那时军代表根本没权威，说话没人听。军代表一看不行了，就打电话给北安河派出所，让他们把杜厦带走。他谎称公安局要拘留杜厦，那派人才住了手。派出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杜厦带上铐子押走。车一到北安河派出所，警察就解开铐子，把杜厦放了。我们连夜进了城。如果不这样假拘留一下，那晚上杜厦有生命危险。

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敢回学校了。有个同学山根，他姐姐在北师院，我们就住到北师院去了。每天练“块儿”（2），练格斗、拳击、摔跤，准备报仇。那次打杜厦时表现最坏的一个叫大鼻子，我们准备和他单练。后来我们还是想弄几把枪，杜厦和山根就去了河南信阳。那时，河南信阳的初中生都有枪。我在北京当后勤，他们要什么我就给寄什么。有一个人爱喝酒，我曾给寄过茅台酒，可那人特谨慎，睡觉枪都不离身。发现找大人不行，就找小孩，后选中了一个小初中生。他特爱武术，我们就用几本摔跤书、武术书，换了两把10响的驳壳枪。但我们三人就两把枪，分不过来呀。山根有个姨夫在湖北军区当干部，他就去武汉把姨夫的五四手枪偷了。他姨夫丢了枪急得要命，报告了湖北军区保卫部，保卫部的人来北京找山根问：你拿了姨夫的枪没有？如果拿了赶快交出来，否则你姨夫要受纪律处分。山根说没有，死不承认。湖北军区保卫部一看我们三个都死不承认，就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湖北军区保卫部一找我们谈话，就预感不妙。我们照了一些拿枪的相，在鹫峰附近轮流放了几枪。然后用布包上，抹了很多黄油，放进一木盒子，埋在学校的果园里。1968年4月份的一天，海淀分局先把他俩抓了，一进去他们就都招了，公安局去果园把枪挖了出来。

我进去的晚，放的也晚，在局子里呆了75天，印象最深就是饿。每天两个窝头，饿呀！窝头说是一个四两，其实也就二两半，我在里面饿昏过两次。每次拿上窝头，捧在手上，先把窝头边上的渣舔干净，一点一点地嚼，咬一小口，要嚼几百下，把窝头嚼成糊了再咽。吃完以后，还要把每个拿窝头的手指头舔一遍。掉地上的小渣渣也要用蘸上唾沫的手指头粘上，放进嘴里。那真是可怕呀！

那里面有个关了一年的，大腿和我的胳膊一般粗了，只剩下骨头，屁股上根本没肉，没有屁股了。哎哟，整个就是一活的骷髅架子。这人是昌平的农民，民兵队长，村里一老贫农没粮食去队里借，队里不借就吵了起来。队长让他处理，他就把老贫农吊起来给打死了。他常常抚摸着自已的皮包骨头，眼泪汪汪。

和我一屋的还有一个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说是现行反革命，进来时就被打坏了，有内伤，整天躺着。我们在里面白天不能躺，必须端端正正坐着学毛选。那个人就在我旁边，白天也躺着，老是呻吟。看守带他去海淀医院看，医院一听是现行反革命，不好好看，没几天就死了。死的那天晚上，他不停地叫。我不知道他那么严重，还嫌他喊的声音太大，弄得别人无法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死了。全号子14个人却十分兴奋。因为他剩下了几个干窝头。大伙迅速地把剩窝头分成14份，每人享受了一份这额外的食物，感觉特别幸福，特别美好。

每个号子里面有一个便池，有一次我站起来小便，起来快了，一下子就晕倒在地。第二次也是站快了，一站起来就“嘣”地跌倒。以后害怕了，在里面走路，都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再扶着墙慢慢走路，像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儿，一步步慢慢蹭。长期饥饿，把年轻人饿成垂垂老翁！里面个个人都这样老态龙钟，说话有气无力。听说现在看守所能吃饱了，是个很大进步，那时就故意不让你吃饱。

看守所里一般都有犯人头，我还当过呢。原来的走了后，我当上了，就是看你没什么大事，负责组织学习。那时候牢头不能随便打人，也不能多吃多占。我们每顿吃饭都轮流第一个拿窝头，牢头也要排队拿。送饭的给你送14个碗，每个碗里放一个窝头，今天你第一拿，明天就最后拿。14天一个周期。第一拿的可以挑一个大点的窝头。说是大个，实际上都差不多，只不过有的窝头多一小鼓包，有的窝头有那么一小坑。刚进去的时候，不饿，我随便拿一个。呆了一个礼拜之后就饿得不行，也使劲挑啊。我眼镜让人拿走了，只好撅着屁股，把眼睛几乎贴在窝头上面挑。饥饿导致了人丧失尊严。后来有一次我饿得不行就含着泪喊：报告班长，共产党毛主席说不准肉刑，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吃饱，这不是变相的肉刑吗？看守说，这还不老实呢！吃饱了你们就该在里面瞎折腾了！由于饥饿，人们说话都声音微弱，更没劲折腾。也有个把折腾的，那是不想活了。大多数都服服贴贴，就饿你这一招儿，能给你治得服首贴耳。

后来给我们办了学习班后就放了。家里没有找人活动。我给家里写信，家里说：谁让你瞎闹的？不管。那时看守所也人满为患，每个号都挤着呢！浑身都是虱子。还不断有新人进来，看你饿得差不多，刻骨铭心了，就办个学习班让你走人。

我记得是7月份出来的，出来以后居然一天长一斤肉，持续长了20斤。这些经历对我当时也没什么影响。我搞枪也不是想去抢银行，当劫匪，坚信大方向正确。当年看过《青年近卫军》，很羡慕他们跟德军打游击的生活。觉得我们迟早要和苏修打一仗，有把枪可以挺身而出，救国救民。当时就想象青年近卫军那样干一番事业，没想干歪门邪道。在里面警察曾问过，你为什么耍枪？我说：我们红卫兵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爱的是手枪匕首，爱的是炸药手榴弹，爱的是埋葬美帝苏修的革命战争。

◇ 牧区生活

出来以后，正赶上去黑龙江兵团的要走。从夏天开始，同学就一批一批的走，到秋天我们学校有一大批人去了内蒙古锡盟插队。1968年11月我们66届的要分到山西农村，我不想去，和杜厦几个商量，就决定去内蒙。当时学校是工宣队领导，工宣队正办一个学习班，学习班里都是打砸抢分子，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因为去越南，搞枪这个事，也在学习班里头。

我们就密谋去内蒙，暗中准备了点钱和粮票。事先，我把这事告诉了哥哥，他又告诉了我妈。我妈立即就让我哥报告给工宣队，结果工宣队把我关进小屋。审查我半天，怕我外逃。我说，我们要去内蒙古插队怎么错了呀？符合大方向呀？家里的人来学校告密让我很丢人，使我对母亲很有意见。最后我们还是私自去内蒙了。走之前最后一刻我才告诉我妈。这次她没反对，

给了我一些钱。当晚我们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了。

时值1968年月11月，到了张家口后，准备步行到锡林浩特，想用这种方式表示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的决心，让人家接收我们。结果走了一段发现不行，内蒙古大草原几十里没人烟，吃饭睡觉都成问题。只好又拦汽车，最后到了锡林浩特，找到了“知青办”，人家表示拒绝接收。因为国家有政策，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块钱，现在他们的经费都花光，无法再安置了。我们当时住在盟中学，呆了几天，眼看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我们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办。正好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的儿子在这个中学，我们就和他套近乎，给他几个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大像章，那时主席像章正火着呢。我们和他混熟了后，他就领我们到他家，我们每人给他爸一份血书。司令员受了感动，大笔一挥，批准了我们。当时内蒙古正在“挖肃（内人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赵德荣是一把手，正掌权呢。我们最怕内蒙这边不要我们，还得回到学校。学校那边的工宣队看我第二次逃跑，气得要命，回去准没好下场。这下我们才放了心，以后就到了西乌旗一个牧场。当时去内蒙，一是觉得牧区比农区好玩，能骑马，射箭、摔跤，比农区有意思。再一个就是内蒙古地处反苏第一线，将来苏修要打我们，最先要从这里进攻。战场就像山珍海味一样，对我们充满诱惑力。当时还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去的。我们在招待所见一女生，也是北京来的。招待所炉子不暖和，冻得她披一条大被子学毛选。后来她和我们分到了一起。

我们去的时候，开始还没兵团，把我们分到一个牧场，1969年3月解放军接管了我们的牧场，就成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5师41团。我们刚到草原时，就赶上“挖肃”。我记得当时《内蒙古日报》上的大标题是《当前“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其实打击面已经很大了，还说是右倾。但我们相信报纸，积极投入了“挖肃”。大多数知青是支持挖肃的，但也有一小批北京知青反对“挖肃”。这批人能独立思考，有远见，比我们水平高。我们当时就是打手。所以我和蒙族牧民关系不好。我们心中想的是下牧区后，千头万绪抓阶级斗争是第一条。要搞阶级斗争，就要积极参加“挖肃”，积极参加抄牧主家。

后来，听说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周总理写信反映了“挖肃”扩大化的情况，总理收到她的信后，才指示内蒙古停止搞“挖肃”。当时滕海青是内蒙古的第一把手，老说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周秉建给总理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好人成了百分之五了，百分之九十五都成了敌人。《狼图腾》的作者吕嘉民也是反对“挖肃”的，还有在宝日格斯泰烧死的那个北京知青杜恒昌也不支持“挖肃”，他们依据的就是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挖肃”违反了这一条。

下牧区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牧主背后都缝着白布条，上面写着牧主分子某某，这与内地不一样。每天早上有个牧主给我们生炉子。我们住在蒙古包里，不生炉子不敢起床。里面跟户外一个温度。我们都穿棉衣，早上棉衣冻得跟铁块一样，一挨住你37度体温的皮肤，刀割一样。等牧主把铁炉子点着，放上一簸箕牛粪，把炉筒子烧红了，包里特别暖和。外头朔风凛烈，里头你却可以只穿一背心、裤衩。我们趁这个机会才能穿上衣服。蒙古人睡觉不脱衣服，只把皮裤脱半截，穿着大得勒，再盖上一个皮被。早上不管多冷，起床都很容易，一点不觉得冷。因为羊毛无论多冷，都是温暖的。很快给我们知青每人发了8张白羊皮，牧主帮我们熏成黄色，熏完以后，就不冒油了。再让牧主老婆无偿地给我们裁皮子，缝得勒。可我们后来还去抄了人家的家，当时我们是比较左的。

1969年1月1日，为了打响搞阶级斗争的开门红，我们突然去抄牧主家。牧主的一条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还这么狂，就想灭了它。我让牧主把狗给拴起来，准备用铁锹拍死。可那牧主不让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脑门冒汗，就丧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顿。这时有一叫赵大嘴的汉人，正好路过，看不过去，就拿大镐把我头上一下，镐把打断两截，我昏倒了。一个老贫农竟替牧主说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和在学校学的概念完全不一回

事！待苏醒过来后，我又把这个老贫农打得够呛。经过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声就臭了，牧民都说我特孬种。当时知青们分住在牧民家，只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独。1969年春节，其他知青都骑着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包的饺子，没案板，拿锅盖当案板，每个饺子跟包子一样大，年三十煮了几个大饺子，算是过了年。那晚上附近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里出来骑马回家，在大野地里嚎叫，跟哭一样，就是那蒙古长调，曲里拐弯，啊啊呀呀，特别凄凉。我现在写作时常听长调。蒙古族历史上曾辉煌过，但后来衰落了。共产党统治下，挖“内人党”把他们挖得心惊肉跳，灰灰溜溜，他们心里非常压抑。你听那歌就能听出来，他们心里有一种委屈，特别悲凉。虽然这歌是歌颂毛主席的。

我们这些中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抄他们时，他们却惟命是从，点头哈腰。我都奇怪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个个畏首畏尾……特别奇怪，后来我想，这是共产党整的。那时，老有一顶民族分裂的帽子悬在你头上。只要一强调自治，一与上级有不同意见，就说你是搞民族分裂。

◇ 转入兵团

1969年3月，解放军一来，我特别高兴，特别欢迎。因为我们整大多数蒙古人，整得处境孤立。解放军也对蒙古人有看法，瞧不起蒙古人，跟我们有共同语言。一说蒙古人就认为有问题，牧主和贫农都串着亲。解放军来后，把我们老知青集中起来到连部住，不再和牧民一起生活。

我们兵团等级森严。现役军人是一等，复转军人是二等，知青是三等，最下一等是蒙古老乡。招待所就特别明显，现役军人住最好的，其次是复转军人，再其次是兵团战士，最差的是蒙古老乡，住的都是大通铺，被子又薄又脏。

改成兵团后，知青待遇是每月工资32块5，牧民就当职工对待，因为我们是牧场，每月四十块钱左右。解放军来后，我刚开始特高兴，后来时间一长就发现解放军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么好。这些干部都是在部队提不上去的，有问题的，犯错误的。他们来内蒙后牢骚满腹，情绪低落。所以在兵团这段期间，我原来对解放军的崇拜，渐渐破灭了。现实中的解放军和电影里的解放军完全不一回事！我们内蒙兵团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每个连的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军医全是现役。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5月内蒙古兵团正式宣告成立，第一年朝气蓬勃，日新月异。当时有个口号：一切为了战备。6月时还挺正常，脱坯盖房，知青们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玩命干。到了10月就特别紧张，成立了武装排，发了枪。这时，矛盾开始显现。复转兵们都是班、排长，领导着知青。谁能发枪，谁不能发枪，他们说了算。包括指导员，他们看不起知青，又嫉妒又轻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呵斥，就上纲。到1969年年底，开门整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我们连北京知青就给连领导写了一封信，书面的提了些。开门整党按连里的计划，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最高指示，学习北京军区司令、政委讲话等等，真正给连支部提意见就一天。我们觉得没提够，杜厦就写一个东西，找了几个北京知青骨干，其中就有在锡林浩特碰见的那个女生，联合签名了一个意见信，委婉地批评了连党支部。譬如吧：作风粗暴，处理问题不公平，多吃多占，大搞一言堂等等。结果呢，指导员气坏了，说我们几个是在北京混不下去，才跑这儿来的。说我们有野心，想夺支部的权。还说我们来历不明，需要审查。憋足了劲要整我们。而导火索呢，就是我和我的班长，一个复员大兵打架。

我从小崇尚武力，在学校刻苦练“块儿”，练过摔跤、格斗、擒拿……而我的班长也迷信武力，到处炫耀他力大无比，说他一个胳膊能夹一个麻袋上拖车，号称在部队里侦察连的老战士都摔不过他。因为我们俩过去曾摔过跤，我摔他个八比零。那么多知青都看着，他很丢面子。

我到了马车班后，他成了我的领导，就治我。晚上让我挑草，早上让我饮马，卸车装车等出公差全让我去。他自己则钻到女生宿舍聊天。

矛盾爆发是为吃饭引起的。有一天特别冷，他让我上山拉石头。冒着严寒，走了几个钟头，装上一车石头就往回赶，因为冷，就把车赶得很快。我眼睛近视，没看到前面路上有一块石头，那石头有尖，我的重车压上去后把我的车胎扎破，瘪了。我只好把石头卸下来，空车返回。先上连部报告，说大车胎破了。正报告时，我们班长也来连部，我站在门背后，他一开门，把我挡住了。他说：“马波把大车胎扎破了。扯球蛋呢，大车胎拿刀捅都捅不破，石头怎么能扎破呢？”他说得对，一个人拿刀是扎不破，但一车石头有几千公斤重却能扎破。我当时就和他吵起来。副连长说，你没吃饭吧，赶紧吃饭去，这个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等我去食堂后，那天吃包子，炊事员说：你的饭，你们马车班给打回去了。我就回到马车班问这个班长，他叫王连如，我说：“我的饭呢？”他说“我没打你的饭。”我说“食堂说你打了”，他说“他胡说呢，你找食堂去”。我又回到食堂，说班里没打，食堂那天天津小伙子说，“没错，他百分之百打了”。我就只好吃了碗干干的小米剩饭。跑了一天，冻了一天，累了一天，他闲呆着还瞎汇报我，还偷吃我的包子。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当面警告他老实点。他自认为身强力壮，谁也不敢惹他。每天没事就去女生宿舍吹牛，人家女生要睡觉了，劝他快点走。他恼羞成怒，抄起扁担要揍人家。他就是这么个二杆子。

第二天一早吃早饭时，我问他，我昨天干了一天活回来，你为什么把我的饭吃了？他说，我没有。我说，炊事班的说就是你打了我的饭。他说没有。我说你以后老实点。他勃然大怒，骂道砍吊哩！咚就给我一拳，从炉子那边一直把我打到墙根，当时穿着毡靴，幸亏我靠住墙才没倒下。然后我冲过去，拿起一个盛面条的铁桶朝他砸去，并把他按在地上，顺手抄起一个装敌百虫的大黑瓶子，要砸他脑袋，他急忙喊：别砸、别砸！因用力过大，离他那么近就没砸着。在我俩撕扭的时候，另有几个人拉偏架，其中有一副班长也是复员兵，他们都向着他。危急关头，杜厦挺身而出，不让他们拉偏手。这样，我才能把对手打倒在地。

晚上，我很早就昏昏欲睡。打一架只不过几分钟，可比干一天活儿累多了。手也疼。杜厦前来告我，那小子对卫生员说“这事没完，七连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杜厦让我小心点。我听后就想得一鼓作气，把他打服了，为民除害，全连知青对他都敢怒不敢言。第二天早上我就主动闯进他的宿舍问：你是不是还要打呀？好，我跟你奉陪到底，手持木棍就打，他拿一大剪刀乱扎，把我手背扎一窟窿。但他没有技术，最后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这时副连长来了说：昨天是他先动的手，今天可是你的不对。让我高姿态，在全连作检查，我说行。后来，我就在全连大会上念了一个检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当时指导员在师里开会。据事后了解，他回来后就埋怨副连长，为什么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也不明白这紧急措施是什么意思？

一个多月后，中央开始“一打三反”运动。是杜厦告我的，让我小心，说最近中央要搞一个很大的运动“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还说咱们过去说的那话就再也别提了。因为我们过去议论过江青，议论过中央领导。1970年1月份的一天，团领导到我们连来宣读“一打三反”文件。那天早晨，我刚起来还没洗脸，就通知我去连部，我说我还没洗脸呢，洗完就去。排长说你现在就去吧。我只好去了连部。指导员看见我说：你来了，咱们谈谈心吧。我很纳闷，大清早谈什么心呀？他说先谈谈你的家庭吧。我就开始说起我们家的情况，正说着，门开了，团政委进来，后面跟着几个拿枪的。问：就是他吧。指导员说就是。团政委说：铐起来！保卫干事就来铐我，我一看来那么多人，就没反抗。我问政委，为什么抓我？他说，你做的事你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过一会儿政委就走了，估计他们正在那面召集全连开大会呢，本来他们想让我在全连会场上亮相。但怕我不老实，就把我押在连部，用一辆白色救护车，把我送到团部。

现在回想起来，七连是个人治社会，指导员是强者，他能允许更强者存在吗？你一个知青把他们引以为豪的骨干摔个灰头土脸，人家指导员还怎么领导你们知青？枪打出头鸟，治服你一个，压服全连人，这是人治社会的统治经啊。

◇ 成了“一打三反”对象

我们团“一打三反”抓了三个人。七连是我，二连的叫冉长发，天津知青，还有一个营建连的，叫阎肃。二连的冉长发是因为班长（复员兵）平时老欺负他，大过年的又打了他。他找连长让给他调班，连长让他先回去，等调查后再解决，他不回，说：大过年的挨打我受不了。连长说那怎么办呀。他说你把我送监狱去，连长说我干吗把你送监狱去，他说我说反动话了。连长问你说什么了，他说：毛主席不好，蒋介石好。连长脸色一变，马上让人把他绑起来。又是一顿打，脑门都打破了，给关到团部小牢房里。当时他18岁，我比他大两岁。营建连的阎肃也是和复员兵打架而被抓起来。据说抓他以后，陈政委说，还有个七连的马波也给我抓起来。指导员恨我们北京的，因为以杜厦为首给他写过联名信，提意见。这联名信他说是政治事故，说他们打破了班排界线，私自串连，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以后就开始把我往政治上整，我到牧区以后，听过敌台，听过苏修广播。这些很多知青都知道，我曾说：只有两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毛主席说了：只了解共产党的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日本一方，不了解中国一方；只了解自己一方，不了解敌人一方……就会犯片面性。必须两方面都听听才对。我听主要是想知道什么时候打仗。我一抓起来以后，别人就开始揭发了。我给陆平女儿写的条子被揭发了，说过邱会作搞过很多女人也被揭发了。我说过《东方红》不能老唱，多好的歌，老唱也要唱腻了，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能强迫搞，还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这种话不算污蔑毛主席。总之，反正就是给你乱上纲呗。

这样我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兵团保卫处冯处长亲自下来调查处理。1970年6月份，全团开大会批斗我们仨，给我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冉长发也定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个牧民判了刑，说是强奸少女。其实他们是双方愿意，因这个牧民是连长的人，指导员要整连长，就说他强奸，把他判了。判过以后，就把我送回连里监督改造。

我当反革命后，给母亲写信告诉了这一切情况，希望她能帮帮我。她给我来一封信说，单是你训练狗咬解放军这一条就是反革命，表示支持兵团对我的处理，要我低头认罪。我妈那时特别左。我到牧区后养了一条流浪的狗，见了谁都摇尾巴。我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梅里美写的，一老太太为给儿子复仇，做了个假人，腰部放上肉，训练一大狗天天扑咬，后来那狗真替她报了仇。我受到启发，也做了一假人，穿一破绿棉袄，其中一个袖子被烧焦了，蓝棉裤，戴一个蓝色棉帽儿，腰部放些骨头训练狗扑咬……结果兵团整我的时候，说我驯狗咬解放军。

这以后我在连里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一块劳改。所有的重活都让你干。白天脱坯和泥，晚上还要加班。比牧民放的牛和马要累得多。所以反革命不是人当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山上打石头，刮白毛风，不能干活了，就学习批林文件。当时批林文件对五类分子保密，不能让五类分子听，排长说马波你出去吧，我们要学习了。外面刮白毛风呀，当着那么多小青年就把我赶出去了。去哪儿呢？我就钻到石头坑底下，还有一个横挖进去的洞，我坐在一个大筐上，大雪很快就把洞口封住了，里面昏暗寒冷。我那天真不想活了，想拿炸药跟指导员一块同归于尽。虽然学习文件不让我参加，但我能猜到林彪出事了。

一般农村比我们强多了，你到县城、到别的村不用请假，老农民还是厚道的。兵团的环境是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在兵团，离开连队必须请假，回家探亲也不能都走，连队总要保持三分之二的人员，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其实兵团就是中国一大专制社会的缩影。兵团领导为了

控制住这些小青年，经常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拉到下面各连批斗，巡回展览，让他们看不听话，不好好改造思想的下场。当时我感觉，离团部越远，气氛越轻松，喊口号，稀稀拉拉，人们似乎还挺同情我们。离团部越近越狠，团部的知青，一个个横眉怒目，恨不得把你吃了。在千人批斗会上，让我低头，我都弯腰九十多度了，还嫌我低得不够，还不停地打我脑瓜子。

批斗完后，我去找保卫干事，说这么处理太严了，不符合事实。保卫干事说，我们对你最宽大了，单是你抢枪这件事就能判你十年。还说对我的处理经过了北京军区，因为当时内蒙兵团归北京军区领导。

刚回连时，排长、班长问我，这么处理你满意吗？我说：我怎么反革命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结果这话反映到指导员耳朵里，他警告我，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说不符合事实是闹翻案，是现行活动。团里说你不老实可以随时批斗。这以后我就不敢说了。当专政对象最大的不好受是别人都跟你划清界限。大多数人都不敢理你了，同学们都认为你是坏蛋，认为你当年说的那些想上战场的话都是假的，是欺世盗名。你是伪君子，你有个人野心，众叛亲离，被集体疏远，这最痛苦了。

后来这个指导员给调走了，谢天谢地，我非常高兴。王连长来后我的处境就好些了。王连长很同情我。我去团部贴大字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74年，中央30号保护知青的文件下发了。当时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报告中提到了反潮流。我就去团部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兵团随便把知青打成反革命，与奸污迫害知青一个性质。这把我们政委气坏了，大会小会点，说我的行动代表地富反坏的利益，是一股反动的逆流。团里批我批得很厉害，连长同情我，就让我到石头山躲起来。山上没人，与世隔绝。虽然和石头、草、老鼠为伍，孤独、寂寞，很苦，但没有阶级斗争，不受气，我愿意在山上呆着。老一个人呆着，话都说不利索了。

后来，我还跑了一次。从我们那到西乌旗有二百里地，沿途只有几个居民点，冬天的茫茫草原很容易迷路，一迷路必冻死无疑。我为了不迷路就沿着汽车道走，但绕远。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吃炸的果子，嚼得特别累。雪水在嘴里融化一会后，嘴的温度低了，再吃雪就融化不了，雪水有一股甜腥味，不能多吃。后来走到阿尔山公社后，离西乌旗还有最后60里，我已走了一天一夜，腿抬不起来了。在阿尔山公社饭馆，我吃了一斤肉饼，那个香呀，至今还有感觉，喝的开水就跟甜水一样。那有我们团的一个转运站，一个院子，几间房子，管转运站的人姓包，他安排我在一间屋子里休息，背后又打电话报告了团部。就这样，我连夜又给保卫干事抓回去。关了一段，参加批斗会，当陪斗。反革命呀，跟苍蝇老鼠一样，可以随便打，随便收拾，生命没有保障。后来还是我母亲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给尤太忠（当时内蒙古负责人），尤太忠又批下来，兵团才下来复查。最后改成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监督改造期间工资照发，经济上待遇还是一样。我上山下乡期间老挨整，所以我写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比较悲惨。

◇ 《血色黄昏》

我是1976年我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的工人。那时，我爸的一个战友在大同市当劳动局局长。我调到大同之前，从1975年秋在内蒙古草原上就开始写《血色黄昏》了。回到北京家里，我想把我在内蒙挨整的这一段写下来，我妈反对。我当时就想写个备忘录，别忘了。我妈不让我写，说我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我没理她，继续偷偷写。白天出去办事，晚上便偷偷写。但到大同以后，我一打开行李，发现我的稿子没了。我立刻明白是我父亲拿了，因为我妈很少进我的屋子。我给我爸写信说这稿子是我插队这些年的血泪结晶，你应该还给我，不应该

偷。你要因害怕而烧毁了这些稿子，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他很快来封信，说我反动透顶，过河拆桥，表示和我断绝关系。我就给我妈写一封信说，父亲偷了我的稿子，我向他索，他还和我断绝关系。我以为我妈会同情我，没想到我妈也来一封信，也和我断绝关系。他们俩闹矛盾，但在对待我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害怕我也理解。可一般家长不会做的这么绝情，为写点东西就跟孩子一刀两断，也太极端了，他们和我感情上还是比较疏远。他们和我断绝关系后，我在大同又重新写。下班后，哪里都不去，就闷在宿舍里写。我非要出这口气，非要写！当时没想发表，就是备忘录。称我为老鬼的天津知青喜刚说，你写那干吗？根本不可能发表。但我心里窝着口气，不写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的一个女孩总躲着我，我想写出来，让她看一看，让她知道我不是坏人。当时父母与我断绝关系，回不了北京，自己一个穷工人，社会地位很低，连个老婆都不好找。后来她真看了我的稿子了，很受感动，我们又接触了一段，但因为思想差距太大，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期最终还是分手了。

1976年秋，没想到“四人帮”倒台了，变天了。1977年底，我还能参加高考。那年高考各省自己命题，山西的高考作文题是《知心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我没想到当了这么多年反革命，又三十好几了，还能进考场，真是百感交集。我一边写，一边掉泪，钢笔尖戳着桌子梆梆响。过去看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好羡慕呀！没想到，咱也能进考场，那真激动啊。我一进教室就写，直写到结束铃响了，我也写完了。监考老师总看我。据说当时很多阅卷老师看了我这篇作文都掉泪了。1977年那次高考我是大同市文科第一，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伤痕文学的热潮时，我就想出版《血色黄昏》。但是，找了好些出版社都碰了钉子。青年出版社都要给我出了，后来一批《苦恋》，又不敢出了。青年出版社的许岱、王维林看了都说很震撼，难受了好几天。《血色黄昏》的手抄本曾给好多人看过，大多数人的评价都很好。《今天》的赵一凡看后给我写了很长的读后感，现在还保留着呢。郑义看完后特激动，在《黄河》上还给我登了一段。但是出版社还是迟迟不敢出，有顾虑，如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等。我妈只给我介绍过花城出版社，这是她唯一给我介绍的一家。她听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认为我的书可能有点价值，不再反对了。但花城的编辑看后说“立意不高，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有典型意义”。我当然不接受，又把他的信退了回去，说他这纯粹是奶油小生之见！母亲曾看过我这部稿件的前几章，说我打架写得，但后来说忙，儿子写的书，她也没全看。

有些人还以为我沾我妈什么光了，我绝没沾什么光，我的书是靠它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我上大学后，父母还曾和我断绝过一次关系。那是因为抓魏京生，我和我爸辩论起来了，他说抓得好，抓得对。我说不应该抓，凭什么以言治罪？我爸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难得的领袖，我说小平同志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对，他抓魏京生就不对！老父勃然大怒，让我滚蛋。我就离开了这个家门。

我后来算算，《血色黄昏》一共碰了14家出版单位的钉子。幸亏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南云瑞调到工人出版社当副主编了，他又想起了我这部书。1986年夏天，他对岳建一说：杨沫的儿子写了一部稿子很不错，你给我找来。岳建一四处打听，终于满头大汗跑到我家。这本书终于在1987年冬天出版了。书出来后，我没告我妈，因为她那时也出了一本《英华之歌》，几乎没啥反应。我怕老太太伤心，没告诉过她我这部书怎么轰动。结果她对我姐姐说，小波出了一本书，也不给我一本。我这才送给了她一本书。因为当初为反对我写这本书，她曾和我断绝关系，在我心里总是有一个疙瘩，跟她不愿再提这本书的事。

◇ 背井离乡

我大学毕业后，当时分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但不知何故，被拒收，说我岁数大了。后来我了解到，是有个女生向学校告我们班主任，把我作为了一个例子，说我分配工作走后门什么的。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我跟父母的对峙状态。但我确实也不想去电影厂，想到一个报社去，能接触实际，特别想去法制报。因为自己当年当过反革命，知道受冤屈，告状难啊，很想替老百姓说说话。因为没有单位，有一段时间我就靠老婆养着。之后，学校又把我重新分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了两年编辑。最后我还是调到法制报去了。1989年“六四”时，我就在《法制日报》。

当耀邦下台时，我特别窝火。《血色黄昏》出版后我没给任何大官，就给耀邦送了一本。因为耀邦和我老婆家认识，我老丈人是原中组部副部长，1930年代耀邦被打成AB团时，就是他接替的耀邦，他们30年代就认识，是老战友。从他们家我知道耀邦这人品行特别好。他不像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多年官以后，缺少人性。耀邦却是能帮就帮，不怕被扣上走后门的帽子。他说老同志有困难当然得照顾照顾呀！在党性高于一切的共产党队伍中，他这种讲人情的干部是很少见的。何况我又曾在1967年批斗“三胡”（编者注：指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的会上，亲手押斗过耀邦，也有一种内疚吧。我在给他的书上写道：当年曾押过他，很内疚。所以特地送给他一本我的书。没想到他去世前不久和广西的一个教授李洪欣聊天时问：你们认识不认识老鬼，请转告他，他给我的书，我收到了，写得很好。1989年耀邦去世后，李洪欣终于找见我，把耀邦托付的话转告给我。当时《南风窗》还登了这件事。工人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去世后，床头有四本书，《血色黄昏》就是其中一本，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是从“黄雀通道”逃出去的，没护照，我到那边儿一年多就想回来了。我找纽约总领馆，领馆说请示国内有关部门，一请示就没音信，一年、两年、三年，总没消息。美国好是好，但不是我的永久栖息地。在美国，我感到我是最底层、最穷的人。我在美国人眼中，就是城里人眼中的外地民工，这个感觉很不好。在中国，我虽然被开除公职，属于穷作家，但比我更穷的人还很多，所以我的心情还好一些。但在美国的中国人里，特别是作家里，像我这样混得如此潦倒的，很少。我干过司机、装卸工、送外卖、看仓库、给富人遛狗、打扫卫生、搬运图书、地毯商店的伙计、看护艾滋病人等等。

我的孩子也在美国。我看别人开电招车挺挣钱。我也想法子买了辆开，希望能挣点钱，让孩子过点有生活质量的日子。等我干时，却挣不了钱了。因为干这行的太多了，都是第三世界来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原以为白天干活，晚上可以写点东西。后来发现开电招车特熬人，你每天必须干12小时以上才能挣钱。这样回到家只想睡觉，根本写不成东西。流亡的生活不是鲜花，不像小说那么罗曼蒂克。那是很苦、很悲惨，缺少尊严的。有些人能说会道，能找到钱，过得挺好。我不行，我嘴巴笨，又不善交际，在美国就只有靠卖力气，所以处在最底层。频频受到美国人白眼之后，我干脆呆在家里，专心写东西。

《血与铁》是我在美国写的一本书，回忆了自己插队前的生活，把文革中干的那些坏事都写出来了，也算是一个忏悔吧。因为美国人特别不理解年轻人为何这么狂热地参加文革？我想应该好好写写这个原因。文革前有那么多思想改造运动，对年轻人反复的革命教育，这种洗脑，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把千千万万年轻人铸成了绝对忠于领袖，绝对忠于共产党的“党卫军”。所以一到文革开始，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忠诚和革命时，就拼命投入，拼命表现。

我后来回国是母亲帮的忙。我与美国是个“民族矛盾”啊，与国内政府是“阶级矛盾”，按惯例，“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吧。所以，我就找母亲帮忙回国。我妈晚年大彻大悟了，

临终前帮了我一把。1995年我妈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就给乔石写信，获乔石批准，一路绿灯我就回来了。

我回国后，曾多次给单位写信，说对反革命分子也应该给出路，不能开除了事。但没人理我。有人劝我，《法制日报》不敢给你解决，给上面写信吧，但给上面写了也没人理。没人理就没人理。反正现在房租、水电、取暖费等都欠着，还可以住，没人赶我走。每天吃食堂，几百块钱就能活，有口饭吃就行了。我从来不去理发店，都是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剃光头。除了写书，我没什么娱乐，花销不大。现在我成了中国最低层的了，没有单位，没有分文收入，连烤火费都交不起，但我不后悔。

我现在是以卖稿为生，但我不写那些应景文章，写的都是大部头。我的电脑里共有五部书稿，但是没人给我出。我写母亲的这部书是给出了，但别的书还是出不了。写老干部的《胡开明传》就没人给出，我还写过一个监狱政委，是我在法制报亲手处理的一个冤案，直到现在也没人敢出。我还翻译了一个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传记，也没人出。马克思对布朗基这个人是肯定的。布朗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巴黎公社期间，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名誉主席。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正面肯定过他，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中说中共早期受布朗基冒险主义影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以后布朗基在中国的处境都不好，都是被批判，被否定的。他是主张暴动的，不过他为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精神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布朗基的那种精神并没有过时，他一生为穷人奋斗，替穷人说话，还是要肯定的嘛！现在穷人依旧是大多数，他们过得很不好，应该有人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利益奋斗。

经过这么多年的坎坷，我已经明白，我这一辈子发不了财，我就不是发财的命，所以绝了发财致富的念头。能写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就知足了。

注释：

- （1）当时流行的一种球鞋。
- （2）方言，指肌肉发达。

□ 节选自《回忆与反思》

~~~~~

【春秋史笔】

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

• 雷 颐 • 丁 东 •

首期“共识书会”于2011年10月15日举行，共识网请到雷颐、丁东两位老师，和与会嘉宾一道就《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展开了讨论，本次读书会同时参考了同样新出版的《心灵的对话》（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揭开尘封历史，寻找未来之路。以下为主讲嘉宾发言节选：

雷颐：

◇ 文革时期的圈阅制

文革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经常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从来如此。所谓圈阅制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所谓圈阅就是在看过的文件的某个位置画个圈，不说好，不说不好。这就为后来的执行留下了极大的余地。比如开始圈阅表示什么，后来圈阅表示什么。就像皇帝批奏章，每一丝一毫的改变都会对事件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毛以后来学习毛的领导人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反复无常做铺垫。

◇ “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邱会作多次在书中提到，“毛主席有私虑”。这个私虑是什么？林豆豆以前跟我一个办公室，他曾经说过“我父亲身体那么不好，这只是一个过渡。”他的意思就是毛最终是希望通过林彪过渡，把位置传给江青。这本书讲在林系和江青系之间的争夺上讲得很细。

关于这个关系，周恩来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们这些人经过九大就突然从基层到政治局委员这一层了，不了解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书里讲了很多例子。比如政治局会议时江青看起来很不高兴，吃药的时候骂水太烫。周恩来劝她息怒，又让别人倒水，倒水之后周恩来亲自用手摸摸杯子试试水温，才对江青说“可以喝了。”还有一次带着很多人去见江青，江青故意让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去楼梯搀着江青等等。张春桥送给江青一只训练过的哈巴狗，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江青居然把那个狗带来了。周恩来来了，这条狗就使劲作揖而且朝他扑上去，周恩来气的脸都发抖。这些细节挺有意思。而据邱会作推断，实际上这些都是反应出了江青当时的地位以及即将要掌权的态势。

而从毛泽东方面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1971年毛南巡，在武汉说“我们都不如江青，我都不如江青，你们要向江青学习。江青政治水平高，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的盖子，都是她揭出来的，我都要向她学。”这在《李作鹏回忆录》记载。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跟我说过，李作鹏本来自己还写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毛评价江青的东西。毛说江青怎么好，怎么伟大，只是要发表的时候家属让他又修改了一下，最后出来的文字才没有这么露骨。

◇ 历史研究的盲区与陷阱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每个人的回忆录都会有自己的盲区。这个盲区有客观因素造成的，每个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也有主观原因，因为人都会回避对自己不好的事情。所以读个人的回忆录，总是应该抱有一定的警惕性。越是好书，越是要警惕，因为书越好，越重要，就越容易完全相信它说的一切。比如在《邱会作回忆录》中，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价值的书。但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他自己也因为感情的偏向而存在逻辑矛盾。邱会作谈到罗瑞卿、杨成武时，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好话。好像他俩被整被倒台都是活该。连罗瑞卿的自杀他都说，“他是不是故意装样子，跳楼的时候从三楼跳，还脚朝下、头朝上。”等等。

打倒刘少奇时邱会作说“我们这代人对毛主席是及其崇尚的，谁反毛我们就要支持毛主席去打倒谁。”但是同样的关系逻辑就没有运用到林彪和毛的关系上。比如说还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谈到二月兵变的时候，说贺龙搞二月兵变，他也没有明确说，但是给人暗示“成立了首都工作组”，那就很紧张了，就是有人要搞政变。文革前就林彪开始的时候说的。后来他说林彪要发动军事政变，他又变脸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军队的程序，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经过调动一兵一卒，那为什么贺龙那儿搞二月兵变就认为是有可能的？而林彪搞这个就不是。他还有自己的辩解，认为打倒贺龙是应该的，林彪这个就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辩解会有矛盾。而在另一本书《心灵



的对话》里面，邱会作也对红八月当时打死那么多人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对物不对人。原话是“如果仅仅让红卫兵把注意力集中在破四旧，对事不对人就对了，不应该打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应该打走资派。”

#### ◇ 经不起推敲的假“民主”

邱会作一方面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了表现合法性，把一些关在牛棚里的中央委员叫出来要求他们参加投票。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投票来开除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另外一方面又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民主的，认真发扬民主，各种观念都可以说，他举例说叶剑英猛批朱德，王震猛批刘少奇，等等。实际上可以看出他自己是矛盾的，把这个能作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民主的标志吗？当然不能。这些都是为了要贯彻毛的意图，是毛要求叶剑英批朱德，要求大家都要批刘少奇。如果当时同时有很多人支持刘少奇倒可以说是民主。这种政治几乎就完全是一种对个人的效忠。

#### ◇ 当时的政治文化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谈到了中共那一段时间政治文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大影响。到处都是派系山头，政治阴谋，人人自危。任凭你今天红的发紫，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这种政治文化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在党内，必须讲党内民主，至少要有规则。往高了说，国家应该有宪政。人人都应该受到法律普遍并且平等的保护。

#### ◇ 毛的策略与毛的“遗产”

从策略上说，我觉得毛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集中力量做一个事情。国家战争状态的时候， he 可以和汪伪联系，就是要打击国民党。在经济建设中，一看到缺钢， he 可以什么都不管，集中力量练钢。这种就是毛的权谋策略，不讲规律，不讲道德，不顾后果。

到现在为止，很多企业家依然很推崇毛的策略。毛的影响还非常巨大。但中国社会要进步，要走向政治文明，也要走向商业文明。这需要我们走出毛的斗争意识和思维方式，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丁东：

#### ◇ 《邱会作回忆录》的主要价值

第一，说一下我怎么判断《邱会作回忆录》的价值。

因为不管我们的历史最终给邱会作怎样的评价。从他进中央文革碰头会，进军委办事处，到最后进政委，到九一三下台，一共在中央核心干了四、五年时间。这个经历首先就非常有价值。

现在我们手上的回忆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自己写的和秘书班子给写的。从出版上来看，也可以分为两种，是在大陆出的还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出的，有秘书班子给写的，一般来说价值不高。因为必须按照中央的决议以此作为框架来填空，跟这个决议一致的就往上写，不一致的不写，或者 he 把这个事实按照决议的结论修改了再写。目前来看，在大陆有秘书班子写，又在大陆公开出版，价值最高的还是薄一波的回忆录，但依然逃不出这个问题

真正价值高的还是在香港出版的书。在香港回忆录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政治上走背字的。比较早的有《王力反思录》。邱会作读完这本书，说，“他是秀才，我们是封江大隶。”语气里就看不起王力的回忆录，现在他的回忆录出来，果然比王力的分量重。这是和文人回忆录比。而即使和邱会作情况一样的，比如跟吴法宪、李作鹏的回忆录比。我觉得邱会作比他们的分量还是更重，价值还更高。

到目前为止，中国高层领导人写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最高的我认为就是邱会作。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本《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卷还不是他的整个手稿。据我了解邱会作留下的手稿有150万字，这个上下卷不到80万字。剩下的70万字是什么，现在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邱会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做了这个《邱会作回忆录》，二儿子也在香港出了三本对话录。两本是文革对话录，一本是历史对话录。现在有人把这两个儿子各自运作的书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儿子做的是减法，虽然有点东西删掉了，但是可以信度比较强。二儿子做的是加法，有可能是自己在父亲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东西。现在没看到原稿，也就无从判断。但是可以留下的悬念是，邱会作留下的东西要比这两本书都要多，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和李作鹏回忆录比，邱会作这个显得更加丰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时太原的山西省委对李作鹏的安排是不错的，周围对他都不歧视，比较同情，除了公安厅的值班人员除了拦住记者、作家采访，对他个人的行动不限制，对他非常友好。李作鹏回忆录里，有这样一句对他的要求“你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可以考虑公开出版，如果写后来这些，那要经过审查。”所以李作鹏写回忆录把劲都使在东北上了。进了政治局这块儿，篇幅就非常小了。

邱会作就不一样了，他从秦城出来安排在西安。陕西给他安排的不好，他要求住一个有暖气的房子，人家就是不给，结果他自己生煤烧炉子，差点儿没给熏死。经济上也很困难。比如他在回忆录里说到“一开始用的是百家纸，到处找稿纸，凑着写。”当时他也没有票证，想买点儿菜和肉都很困难。我觉得从这一点可以推断，他说出真相的动力比李作鹏更强。

从邱会作个人来说，他对细节记的很好，头脑非常聪明。他的记忆能力，对事实的选择能力，捕捉能力都非常强。他不会概括的说，都是讲事儿，讲细节。这些事儿背后能呈现出什么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一定想得很深。但是这恰恰是最珍贵的，我们可以从中有更加丰富的解读和联想。从这一点上，我觉得《邱会作回忆录》是现有高干回忆录中的独一份。

◇ 该书史无前例地呈现出当时中共高层的运作机制

第二点感想就与这有关。它给呈现的中共高层的运作机制，人际关系和这些领导人的人物性格。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过去这是一个黑箱，我们只能远远的望，看不清，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儿。邱会作一定程度上把这个黑箱打开了，让我们看见里头很多我们过去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怎么产生？过去都是名单公布，揭开盖字大家才知道谁上去了。但是邱会作在回忆录里介绍了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过程。

当时组成九届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搭了一个小班子，把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这四个人找来，说要研究中央政治局的班子怎么搭。九届很特殊，不是事先把名单弄好才开会，而是党代会都散会了，才开始研究这个政治局班子怎么搭建。毛泽东把这四个人叫来说他和林彪两

个当后台，周、康和黄三个人组这班子。后来周恩来说“不管怎么说，主席还得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多少人？”“25人到30人。”毛回答。邱会作当时不在场，但是他后来当选了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把这个情况前前后后都告诉邱会作。

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把九届政治局搭班子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名单一开始的范围是多大，怎么筛选，怎么反复，最后添了谁，去了谁，怎么去的……特别具体。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中共领导核心名单的产生过程，那么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

最微妙的地方就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一个细节是：一开始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拿出一个23个人的名单，里面有江青，没有叶群。但是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一叉子，加上叶群。说，“康生推荐了王效禹，毛泽东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周恩来他们三个人拿上名单到林彪处，林彪就把叶群一勾，他们三个人又再讨论。最后三人讨论说江青、叶群还是得上，我们要说服主席。再给添上去。毛第二次再勾掉江青，这次毛泽东加上了纪登奎和李德胜。到了林彪那儿，林彪再把叶群勾掉。最后三个人开会说名单差不多了，我们只要说服林副主席把江青和叶群加上去就行了。第三次再到毛那儿，毛说，你们说让上就上吧，我负这个责任。到了林彪那儿，林彪说：“叶群上不上，我都服从主席的安排。”最后弄出一个名单来。

这样的细节史料价值非常高。有的学者看了这个细节，说毛泽东就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他勾掉江青加了叶群是什么意思呢？叶群无论是资历还是重要性都不如江青。大概只有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开九大，如果江青进不了政治局，估计得乱套。因为江青在九大以前地位非常显赫。当时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叫中央文革碰头会，是江青和周恩来共同主持，周恩来处处让江青三分。周恩来曾经对邱会作说，什么叫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的关系”。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如果一开九大反而出了政治局，这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类似像这样的细节，对我们认识高层的政治运作机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

□ 原载《共识书会第一期》

~~~~~  
【口述历史】

几度风雨几度秋（上）

• 李冬民口述 • 阎阳生、米鹤都采写、编辑 •

〔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

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 偷粮票的“侠客”

我老家是河北唐县，属于太行山区。爷爷家里条件好一点，供我爹念完了初小，又送到山下县城念了完小1。那时候，我爹这点文化就不得了了，他后来在太行老区里当了校长。生下我后，父母把我放在了大伯家，他们就去了雁北，跟共产党闹革命去了。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唐县上了一年学，1954年到北京的。那时候，我爹在北京市委工业部工作。老干部很忙，都把孩子丢在学校不管。这样我就在住宿制的北京小学上学，因为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我和他们从天性上一直没亲近起来。北京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娇生惯养，没有人了解和懂得农村。刚到北京时，由于习性不同，我总觉得他们很可笑。比如，羊就是羊嘛，他们要说是小山羊；兔子就是兔子呗，他们要说是大白兔。我那时候说话带着口音，一张嘴全是唐县的山里味，所以跟同学们说话也少，属于比较孤独的人。我有时间就看书，那时生活也无忧无虑，我们用童话般的眼光看待世界，对事物的判断也很美好，充满乐观。但是，我心里一直惦恋着我的家乡。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里来的大批饥民，要饭的。我那时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门。崇文门南边是护城河，护城河边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饭的农民。我就跟他们聊起来，问他们是哪的？他们说从农村来的，如何如何……北京小学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是从有苏联阿姨照管的那种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过来的。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实际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了，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看了这些人，听了他们所说的，马上就信了，因为我有对农村的记忆。我身上有个一两毛钱，就给了他们。那时城里人粮食有定量，发粮票。我们市委宿舍中层干部住的院里，也办食堂。食堂有粮票，我不知道怎么动了心。我别的办不到，食堂里的那些粮票饭票啊，都在边上放着呢。我就和朋友夜里偷偷地去拿了这些粮票。

我当时也不觉得这是“偷”，应该是“拿”。偷着“拿”当然也不好了。但我准确无误地知道，我们不会被发现。因为那个食堂，到晚上就彻底没人了。忘了是不是爬窗户了，反正我们就进去了。第二天拿这些粮票分给了那些没饭吃的农民，心里感觉特别好。另外，我接触的一些文学历史，什么《夏伯阳》啊，《敌后武工队》呀，也使我农民有一种喜爱，有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所以觉得偷粮票什么的，有点像援救游击队，或者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的那种感觉。

许多城里的学生，对这种社会现实不了解也不理解。大串联时一看全国各地那么多要饭的，认识社会的门才打开。那时，我认为我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远远高于我的同龄人，特别是只在城里读书的学生。而且，农村的那段生活塑造了我一个比较务实的性格，这对我在红卫兵运动和文革时期的影响都很大。

◇ 跳两级考大学

我的父母都是土八路出身，对分的概念和要求并不强，跟孩子也沟通少。好在我初一、初二都参加了课外活动，初中时我参加了在北海后面那个少年科技馆天文组的课外活动，也不要他们管。

那时候，辅导员看我接受能力强，就把我领到北京天文馆参加天文小组，听周培源讲相对论，讲完天文看星象，像这种时空观念，相对论这些东西，我当时也能听懂一点。我那时就喜欢自然科学，想当科学家，要当学者。当时看苏联一个科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的传记，很有感触。他是非欧几何的创始人之一。他十四岁上的大学，二十来岁当的教授，三十岁就当大学的校长。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课内成绩不错，但在课外学的东西更多。高一的时候，我就偷着摸着，一边当班长，一边白天黑夜的看高二、高三的课程。这都是自发的，于是1964年夏天，我高一就考了一次大学。

当时学校不支持，原因是我们这批学生正上实验班呢，我把他们整个的计划打乱了，就给我算了个肄业。我拿着肄业证书到小西天街道，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去市教育局的社会教育处去报名，在27中的考场考的。北京那时候极少有跳级高考的，我考试成绩应该还不错，录取分够了。我俄语成绩考的是98分。这是我的俄语老师李洪达先生为我记住的。数学那一年开始有加分，我把懂不懂、会不会的反正都答了，我出来和别人对了对，我比认识的几个高三年级的考得还好。

考完以后，就苦苦等大学的回音。那时，郭沫若和钱学森办了中国科技大学，我就认为这个学校是新型的，是反映现代科学思想的学校。于是，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呢，是哈军工，更惨的是把清华报在第三志愿，特无知。最后，是山西太原的轻工学院录取了我。我当然没去，所以最后这件事还是没成功。如果学校和老师支持我，让我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以毕业生的身份高考，估计那年我就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了。

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有时间了。等着和大家一起高考，我等于还有两年时间复习。在我痛苦地等待下次高考的这段时间，我学点历史，学点文学，也学点理论。结果这段时间成为我在这些方面大丰收的时期。小时候看《杨家将》、《说岳》什么的，这时候看的都是些60年代的现代革命文学和外国文学。

学者嘛，都要写论文、写报告什么的，我也想装模作样地学学。这期间，我看了纽伦堡那本《德国间谍的内幕》，还有《美帝国主义的谍报工作》等比较风行的几部书。于是，洋洋万言，写了篇《论间谍》。这篇文章还挺像模像样的。中学的作文我得分并不高，但是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很随手。文革中能写出大块文章，可能与这么一种基本训练有关系。

这时期，我还把毛著从头到尾学了一遍，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的长篇，我都当理论文章来学。那些文章，触发了我心灵中那种革命的萌动，感觉不对的就想要变革。

我们那会儿虽然也不小了，不过对男女之间的事根本没什么感觉。男女合校的学生大概还能启蒙，可我们学校是男校，一色的男生，秃瓢学生。你要想看女生，得上大街上，斜着眼看女12中的学生，算是过过瘾。所以那时几乎没有什么“邪念”。

曲折插话（编者注：李冬民中学同学、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采访时在场）：在学校时，冬民他穿着不讲究，上面一件衬衫，下面一条蓝裤子，在文革中也没怎么见过他穿军装。他有点与众不同，不拘小节。比如说，他开会迟到，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经常性的。比如说咱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那时在北京展览馆曾展出核爆的一些仪器。我们正上着课呢，

他就带着我和几个同学跑去看仪器展。

他确实有点离经叛道，在高一考大学，学校开始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这个在学校里头是很个别的。也是经过一番工作以后，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毕老师特批的。后来他真考上了，但不是他理想的大学。所以他没有去。

那个时期，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就把毛泽东著作全部通读了，马列的东西看得也非常多。应当说在中学生中这是很少的。

◇ 写出一面墙的大字报

1966年，我是高三（2）班的班长，那时叫班主席，也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6月2号，《人民日报》一登聂元梓的大字报，电台一广播，文革就算爆发了。6月3号，高三的一个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校领导要把我们领向哪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马上来了主意，就把以前关于教育革命的想法端出来了。我没批校领导，大字报对事不对人，是对教育改革、对整个国家的宏观大论。

我一写就是长篇大论，有好几十页。大字报矛头指向修正主义，中间好像也写了几大部分，叫反修防修，实际上内容还是教育改革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学习的课程内容很陈旧，几十年前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过了几十年了，都不把这些东西给学生讲。

当时这个举动影响较大，我虽然只是个团干部，但在学校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我们班里就一派，都团结在我周围，我是领导。我大字报写的内容不一定全对，但是我敢写，大家也都敢贴。我一人写，全班毛笔字写得好的都帮我抄大字报。然后我们到学校前面的院子贴了整整一面墙。这在学校挺轰动。

6月9号，乱了几天以后，学校就没领导了。我就带着人到团中央找领导。那时候学校里还没分派别，等于是代表全校把信送到那儿的，希望团中央给我们学校派工作组。25中的工作组是北京市高级检察院的干部，从农村的四清工作组直接调过来的。

工作组大概是6月10号前后进校，他们工作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大家围在一起学《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些牛鬼蛇神什么的。可是咱们教育该怎么改革啊，这些事谈都不让谈了。就我们班还瞎忙活，讨论什么教育革命啊，大块文章还不断的出。然后我又提什么学制应该缩短，写了一堆学制上的设想。同学们也都闲不着，有的领纸，有的抄，有的去大门接人……我们班除了大字报，还有外校来串联的，我天生喜欢串联，外校找我们的电话就特别多。

工作组见我们没事老到总务室领大字报纸，还老写，就觉得我们事多。这时候工作组就开始限制了，不许外校来串联。学校当时有油印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拿钢板刻蜡纸，然后涂上油墨一推。那时候的印刷设备就是这个。我们把我们教育上的主张印了个传单，写了个呼吁书，每次油印几百份给大家散发交流。我们不叫红卫兵，落款是东风战斗组。

终于有一次，去学校领油印机的同学回来了，说工作组不给，说不让印。我们就很抵触了。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